

中國 歷史學四十年

周谷城題



肖黎 主编
1949—1989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肖 黎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國歷史學四十年

周谷城題



肖黎 主編

1949—1989



書目文獻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月堂
封面设计 李 瑞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肖 黎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5.875印张 644千字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 3000册

ISBN 7-5013-0770-9

K·80 定价：12.00元

序

从1949年到1989年的四十年，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绵延不断的发展长河中，是一个不长的时间段。然而，这四十年却是中国史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至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阶段。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许多史学工作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历史学这不平凡的四十年进行认真的回顾，以推动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开辟新的康庄大道，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学的这四十年，我认为可以用两句话概括，那就是：曲折的道路，辉煌的成果。

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而是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向前迈进。

中国历史学这四十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逐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从而使中国历史学在科学的大道上突飞猛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成长、壮大起来，并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未来历史的考验。然而，在这个阶段，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下，中国历史学在

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因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尽管如此，在这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得的进展和成就仍然是巨大的。

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6年。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空前的历史考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和兜售“影射史学”，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中国历史学脱离了科学的轨道，而且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又受到无情的压制。

第三个阶段是1976年到1989年。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又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开始了它的光辉历程。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历史学家挣脱了“左”的锁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历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斗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克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方法，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方向而努力。同时，在改革开放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史学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从长期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历史学已把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主旨，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总之，中国历史学这四十年的历程，就象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江一样，经历了一个个激流险阻，但它依然向前，汹涌地奔向大海。

中国历史学在四十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我国历史学有着悠久的优良史学传统，有着为世人所瞩目的堂皇巨制。但是，从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及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前和以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研究，已成为史学家们的自觉要求。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在这四十年中，史学界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成果。在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先后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被史学界称为“五朵金花”。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史学界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仅继续讨论一些老问题，还不断地探索新问题，如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历史教育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史学界的重大问题，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加深了，从中也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景象。

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的重要成果。对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受到史学界的日益重视。例如，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加强了对亚、非、拉美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并取得了新的成果。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在近十几年来，史学界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不断地扩大视野，使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新领域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方兴未艾之势。

在所有这些丰硕的成果当中，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是：《二

十四史》、《资治通鉴》的校点、出版，《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大部头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及各种专史的出版，都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水平。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已故历史学家吴晗生前主持的中、外历史小丛书的出版，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近年来翻译出版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及外国历史名著，起到了开阔视野和启迪思想的作用。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形成了一支有理论、有功底、有活力的教学、科研队伍。老一代学者不仅热情地培养中、青年学者，还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探索，写出高质量的论著；中年学者承上启下，发挥着中坚作用；青年学者积极进取，是中国历史学的未来。正因为有这样一支老、中、青史学队伍，成果迭出，令人感奋。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当我们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高唱赞歌的时候，也应清醒地、理智地看到，中国历史学在这四十年间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历史科学是人类反省自身历史的科学。作为历史学家，更应该认真的反省自己的工作。这是因为，反思是人类为了进取的一种需要。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则应当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想得更深一点，自我批判精神更强一点。这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所决定的，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历史学家的特殊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的实践来看，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有具体的、理论的，有微观的、宏观的。从关乎中国历史学的前途着眼，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的指导是需要加强，还是应当淡化；对我国传统史学是批判继承，还是全面否定；对西方的史学理论是有选择地吸取，还是全盘接受；中国历史学是面向社会、贴近大众，还是远离现实，搞经院史学；中国历史学是面向世界，还是闭关自守等等。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里是无法回避的。

反思并不是否定过去，否定自己，否定一切。反思是为了未来。史学家通过自身的反省，将会更加认清自己的目标和责任。对此，我们无疑将充满信心。

为了迎接中国历史学更加灿烂的明天，我们还需要做不懈的努力。

首先，应该继续加强理论建设。

从总的方面看，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的。但这方面的教训确也不少。如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之后，一度也出现了重考据、轻理论的现象；在近年来，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情况下，也出现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另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上，也反映了我们中国史学界在理论建设方面的不足。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的重要原因，也和缺乏理论上的建树有关。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人们感到满意的史学理论著作和历史哲学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为了使中国历史学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需要理论先行，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我们也应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研究上花更大的气力。

其次，历史学家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严格要求自己。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的过去，但其视野也注视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因此，作为一个有出息的史学家，应该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学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不考虑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继续“炒冷饭”等研究路子，已不符合当前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势了。对此，我们应有比较自觉的意识。

再次，要加强群体意识和群体研究。

治史要“通”，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老一辈史学家大都功底深厚，纵通古今，横通中外，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时至今日的中、青年学者，面对汗牛充栋的史籍和应接不暇的信息的情况，“通”，谈何容易。至于有些边缘学科，如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等；有些新课题，如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等；有些新方法，如中外对比研究、古今对比研究等。从研究的水平和课题的需要，一般来说，个人是难以胜任的。如果加强合作，利用群体的优势，取长补短，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同时，也将使中国历史学出现一个新的格局。对此，史学家们也需要审时度势，做出新的考虑和新的设计。

最后，需要重视中国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运用各种形式继续宣传唯物史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中国历史学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诚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远不能视为对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全貌的概括及前景的勾勒。然而，本书对各个专题所做的概述，都出于有关专家、学者之手，寓叙述之中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尽管未可一概视为定论，但诚如刘知几《史通·采撰篇》所云：“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撰写出版，仍不失为对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做一初步总结的一种尝试。这是我与本书诸位作者的共同认识。

中国历史学正处于世纪转变的历史年代。中国史学家们一定能通过坚韧的努力，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增添更多的具有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鸿篇巨制；在理论、文献、方法及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的趋向上，在队伍培养和人才准备上，为中国历史学胜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肖黎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录

序.....肖 黎 (1)

史学理论.....瞿林东 赵世瑜 (1)

历史理论.....蒋大椿 (27)

中国历史文献学.....吴 枫 (63)

历史学方法论.....庞卓恒 李学智 (83)

先秦史.....李学勤 (109)

秦汉史.....林剑鸣 (120)

魏晋南北朝史.....高 敏 (140)

隋唐五代史.....胡如雷 孙继民 (159)

辽宋西夏金史.....王曾瑜 (180)

元史.....邱树森 (202)

明史.....顾 诚 (217)

清史.....王思治 李鸿彬 (237)

中国近代史.....龚书铎 郑师渠 (257)

中国现代史.....魏宏运 (295)

中国政治史.....白 钢 (328)

中国法制史.....张晋藩 (356)

中国农民战争史.....苏双碧 (373)

中国经济史.....郭正忠 魏 林 (392)

中国文化史.....刘志琴 (419)

中国社会史.....田居俭 (439)

中国民族史·····	杜荣坤 华祖根 (460)
中国考古学·····	王世民 (487)
中国历史文物·····	姚涌彬 (505)
中外文化交流史·····	谢 方 (522)
中国历史地理学·····	谭其骧 葛剑雄 (552)
中国史学史·····	施 丁 (572)
台湾地区史学·····	王戎笙 (603)
美国史·····	杨生茂 杜耀光 (630)
西欧史·····	杨丽华 (645)
苏联史·····	王 新 (669)
东欧史·····	韩承文 (688)
日本史·····	汤重南 (705)
亚洲史·····	何芳川 (725)
非洲史·····	郑家馨 (744)
拉丁美洲史·····	李春辉 陆国俊 (760)
国际共运史·····	高 放 (774)
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 (795)
跋·····	肖 黎 (814)

史 学 理 论

瞿林东 赵世瑜

一 引子：艰难的起步

在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中，关于史学自身理论的研究，起步甚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于历史学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则缺乏明确的和自觉的意识。诚然，这种情况固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历史学界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对于改造旧史学、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史学工作的全局来估量，这是新中国的史学区别于旧中国的史学之根本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一切科学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的指导理论，却无法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其中也包括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不论因为何种条件、出于何种考虑，历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误解、忽略，致使在很长的岁月中，始终没有把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提到历史学研究的日程上来。尽管有些研究者的论著曾经涉及到史学自身理论的某些个别方面，如历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历史学研究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毕竟不是明确地从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上来考虑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

二是在相当多的研究者中，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混淆起来；而我国史学界历来对前者即历史理论的研究比较重视，这就

势必削弱对后者即史学理论的研究。当然,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前者是史学家对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后者是史学家对于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没有前一种认识活动就不会有后一种认识活动,而后一种认识活动的发展又会推进和优化前一种认识活动。这说明,它们是互相依存的。但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则又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以客观历史发展为对象,后者以史学自身发展为对象。这说明,它们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并不是相同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关系,晚至80年代中期才被明确地提出来,这也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迟迟举步的一个原因。

三是从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后期,将近30年中,我国历史学界基本上处于同外国历史学界隔绝的状态,从而严重地阻滞了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开展。从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和所了解的信息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同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获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完全照搬、袭用这些成果,更不能以此来代替我们的史学理论建设,但对于它们的了解、“引进”和介绍,无疑会催化、促进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在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我国历史学界失去了这种国际性史学交流的机遇,乃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举步甚晚的又一个原因。值得庆幸的是,这种隔绝状态自70年代末期开始已逐渐有所改变。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在今天来考察40年来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其主要问题时,不能不首先考虑到的。唯其如此,我们对于史学理论研究之举步的艰难,才能作历史的看待。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国历史学界对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关注,是从80年代开始的。但这并不是说在50—70年代我国史学家不曾提出过任何有关史学理论的问题,只是在那段时间里,它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领域被明确地提出来。同时,这也并不是说

中国历史学缺少研究自己或从理论上反省自己的传统,因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早在8世纪初(710年)就写出了世界史坛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其后乃有18世纪末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近代史学家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李大钊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都是这种传统的表现。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举步,是中国史学发展中最深刻的一次反省,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五次反省”,见蔡世华文《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的对话》,《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

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起步,是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是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批判“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是我国历史学界史学家群体努力的结果。而1983年,则可视为这一起步的标志:

——这一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会者就“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见包凌云等:《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综述》,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历史学的指导思想,一是历史学的社会作用。它们都是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在史学界的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广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年6月,《世界历史》杂志发表了题为《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明确地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

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
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见《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这一论点,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少史学家的共同认识,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同一期杂志,还发表了题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座谈会发言摘要,分别介绍了与会的我国一批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建议。

——这一年6月和7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这是新中国史学发展中最早问世的两本史学概论,是这时期第一次公开出版的高等学校历史系史学理论教材。这两本史学概论在内容上和论述的重点上各有特色。前者的主要内容是“概述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和一般知识”,“帮助学生联系历史研究的实际,逐步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相应地使学生掌握一些研究历史所必备的知识 and 技能”(《历史科学概论·说明》)。后者则强调史学概论的任务“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导下,概括地论述史学在发展中为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及其成就,并指出当前史学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史学概论》第21页)。由这两本书所引起的关于史学理论或史学概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任务的讨论,曾一度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以此为标志,史学家们已不止是提出问题,而且开始着手于建设了。

——这一年,根据全国历史学规划小组建议,由《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江汉论坛》编辑部联合发起的首次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着手进行筹备。历史证明,这个会的筹备和举行,以及其后每年一度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组织全国史学理论队伍、引导史学理论研究深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40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中,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迈出这一步是异常艰难的,但这一步毕竟已经迈出去了。从那以后,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高等学校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先后在北京(1985年)和天津(1986年)召开了史学概论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创办了《史学理论》杂志(1987年);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自1988年起联合举行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这项活动得到了国家教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部门的有力支持;《史学理论探索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等陆续出版;其他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也逐年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有的甚至开设了史学理论方面的系列课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设立了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史学理论研究课题;国家教委也把史学理论教材建设列为重点项目;更重要的是,一批青年史学理论研究者,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成长起来,等等。可以认为,在80年代,史学理论已真正成为中国历史学中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尽管历史学的发展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干扰,但史学家们对于理论研究的兴趣却是在日益增强。如果说,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自身反省的学科的话,那末,它在80年代的起步正预示着中国历史学将出现一次新的变革。

我们在本文中概述的几个问题,有的是属于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有的则是属于同史学理论建设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也还有一些本应在这里作出综述的问题,如关于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问题(即史学的体裁、体例问题)、关于史学家自身修养和对于时代使命之认识问题、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认识问题等,因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这里一并从略:前两个问题,在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两书中,